

浙江名人研究大系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主编 万斌

胜国宾师

朱舜水传

钱明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胜国宾师

朱舜水传

钱明 著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胜国宾师;朱舜水传/钱明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11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万斌主编)

ISBN 978-7-213-03802-0

I. 胜... II. 钱... III. 朱舜水-传记
IV. B248.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2162 号

胜国宾师——朱舜水传

钱 明 著

-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176516
- 责任编辑 章 依
- 责任校对 戴文英
- 封面设计 池长尧 殷 瞻
-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杭州桐庐瑶琳镇)
-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 印 张 11.625 插 页 2
- 字 数 27 万
-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213-03802-0
- 定 价 25.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万 斌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使人瞠目结舌！面对这么一块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

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

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 and 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

而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汉末的京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这其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顗、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昇、朱肱,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

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引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龚自珍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珪、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

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赟、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

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 20 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丏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20 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个我院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正在陆续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

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若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的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唯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

是为序。

2003年春于杭州

目 录

引 言 舜水序曲	(1)
第一章 家世身世 学风学德	(21)
出身名望	(23)
三传而绝	(32)
第二章 弘扬古德 兴学设教	(44)
漂泊海外	(44)
定居长崎	(70)
讲学江户	(121)
第三章 情深义重 相知相惜	(159)
舜水与安东守约	(159)
舜水与德川光国	(197)
舜水与前田纲纪	(215)
第四章 畸人轶事 誉满内外	(226)
回传故土	(227)
中日互动	(273)
华夏合颂	(278)
东瀛记忆	(302)
回顾反思	(313)

尾声 舜水余音	(322)
柳川遗迹	(323)
江戸遗迹	(325)
茨城遗迹	(330)
舜水遗存	(333)
朱舜水大事年表	(338)
参考文献	(346)
后 记	(359)

引言

舜水序曲

明清之际是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王朝更替,天翻地覆,社会动荡,生灵涂炭。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和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有力地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孕育出了一大批领时代风骚的杰出人物。一时之间,人才辈出,群星璀璨,朱之瑜舜水先生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舜水的出生地余姚龙泉山麓,距离比他早 128 年出生的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的出生处瑞云楼仅数百米之隔^①。“阳明”之号取之家乡的山名^②,而“舜水”之号得之故乡的水名。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可两人的性格却与孔子所言正好相反。喜欢水的舜水,长寿、好静,素以学问家见称;而喜爱山的阳明,则乐学、好动(个别时期除外),素以思想者著称。水的性格是虚而善变,山的性格是实而具象,这也恰好与阳明、舜水的性格相悖。可以这么说:以山名

① 舜水说过:“王文成为仆里人,然灯相照,鸣鸡相闻。”(朱谦之整理点校:《朱舜水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85 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书名与页码)

② 阳明之号来源于阳明山或阳明洞,关于阳明山或阳明洞的考证,可参见拙著:《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上篇第一章,人民出版社即出。

为号的阳明之性格近于“水”，而以水名为号的舜水之性格近于“山”。舜水的率真和固执，曾给他带来过许多误解和烦恼；而阳明的善于应变、讲求谋略，却使他获得了一次次的丰功伟业。可舜水与其常常引以为豪的王阳明在思想性格上的这些差异，并不影响他对阳明之思想深蕴的汲取与提炼。舜水能够为日本人所喜爱，其身上所具有的阳明的怀疑精神和务实作风，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元素。诚然，就舜水的总体思想倾向而言，应该说是尊崇朱子学的，比如强调“朱子道问学，格物致知，于圣人未有所戾”；又认为《四书》、《五经》“朱子之注不可废”，“至于晦庵之注，自当遵依”。但他更强调“看书未必单单靠得注脚……为学当见其大，实实有裨于君民，恐不当如经生寻章摘句也”，^①这与阳明的内在气质有颇多相似之处^②。正是基于“为学当见其大，实实有裨于君民”的原则与向度，舜水反对空疏的讲学之风，尤其嫌恶门户之争，认为“朱、王之异，不当决于后人之臆断，寒暖之向背，即当以孔子断之”^③；从而凸显出他反对近世儒者之习气，强调复归先儒，以圣道为判断标准的鲜明立场。从表面上看，舜水的认知标准过于教条、陈旧，但若放到其所处的特殊环境下予以考量，就可看出它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他是想为中国传统社会找回自己的坐标，为中国知识精英扛起儒学源头活水的大旗，为东亚夷夏关系提供历史转换的可能。这是从舜水思想中涌现出来的最具震撼力和跨文化意义的潜质。

① 《朱舜水集》，第85、381、385页。

② 张君勱认为：舜水“曾受教于东林学派张肯堂门下。如果此一渊源没有错，那么，朱舜水一定是反对阳明学派的”（张君勱：《新儒家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2页）。此说过于武断。关于舜水与张肯堂的关系，详见本书第一章；关于舜水学与阳明学的关系，笔者将有专文阐释，本书暂不详述。

③ 《朱舜水集》，第84页。

世人习惯以钱塘江为界把浙江文化分为上下两块,即所谓“两浙文化”。舜水出生于地处浙东的余姚并在那里生活了近20年,又在地处浙西的松江生活了25年,自称“生于越而贯于吴”^①,所以在他的身上,既有浓重而深切的浙东民物风情之情结,又有深邃而厚实的浙西学风文思之内质;既表现出浙东文化实行实用之向度,又表现出浙西文化精雕细琢之志趣^②。舜水的科第生涯始于浙西,他的学术生涯亦可谓始于浙西。比较而言,如果说余姚是其生命与精神的家园,那么松江便是其学问与知识的故乡。也就是说,浙东的风土人情对其情感世界的构造具有决定性作用,而浙西的人文环境对其学问世界的感染具有关键性意义。这种微妙差异,可以从其怀念余姚人物风情而思念松江师长道友的诸多书简中感悟出来。比如德川光国知道杨梅是余姚的特产,所以只要有杨梅,就会想到舜水,而舜水在得到所赐杨梅后,便会倍加思念余姚;所谓“岂独是德祖家珍,仿佛见故园风味”,“登高令节,每忆龙山……对物怀思,徒增感慨”^③,便是这种情感的真实流露。而笔者所谓舜水的人文情怀主要来源于浙东、其学术资源更多地来源于浙西的论断,即是由此得出的。

若仍以阳明、朱子为例,似可谓舜水对阳明主要是情感上的

① 《朱舜水集》,第74页。

② 关于两浙文化地理的特征及其差异,可参见拙作:《“浙学”的东西异同及其互动关系》,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近世“浙学”的东西之分及其走向》,载《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1期。

③ 《朱舜水集》,第138、339页。

钦佩与受容,属于精神气质的范畴^①;对朱子则主要是理论上的接纳与汲取,属于学理致思的范畴。而他所努力追求的,乃是超越朱王、复归先儒古德的圣道理念,这与明末清初的思想大师们有不谋而合之处。他曾对弟子安东守约说:“贤契旧学亦无所失也,但不当拘泥执着尔。学者之道,如治裘蓑其粹然者而取之。故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故曰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若曰我某氏学某氏学,此欺人盗名而巧取世资者也,何足效哉?……至于更为朱、陆两可之见,则大非也。世间道理惟有不可不可二者,无两可者也。两是者,汉廷之畏势者也;调停者,宋室之基祸者也。”^②他是希望结合中国实际,开拓出一条既不同于朱学又不同于王学的独立道路,而其针对守约旧学所作的批评,实际上针对的是当时日本的官学朱子学。当然,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朱学而推重王学,而是反对门户之争、倡导先儒古德。从理性的角度分析,舜水身上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学人风采,既彰显出了理学、经学、史学等精英文化的内在质地,又表现出了实用科技、百工技能等市民文化的鲜活素养,这些都无不代表了明

① 按:舜水曾对安东守约说:“阳明先生为不佞比邻,向曰所言终不肯少有阿私,贤契犹能记忆否?”(《朱舜水集补遗》,第14页)其弟子木下贞干亦曰:“舜水朱子甚敬守仁,得其文必改容称叹。”(《朱舜水集》,第807页)表明舜水内心深处还是很敬佩阳明的。在他的身上确实体现出一种类似于阳明的精神气质。他不仅赞赏阳明的事功,更推崇阳明的个性,只是不满于入于禅的阳明后学以及朱王之间的门户之争。

② 徐兴庆整理点校:《朱舜水集补遗》,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版,第14—15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书名与页码。按:作为本书重要史料来源之一的《朱舜水集补遗》,是徐兴庆先生1991年编纂的,笔者在引用时,发现有一些错误,有的疑是原文抄录时有误,有的疑为编者标点有误。但为忠于原著,笔者一般不作修改。

代以来江南人文精神发展的基本方向^①。

不过舜水学的久远价值,似乎并不反映在舜水自身的思想创设下,而是体现在中日两国数百年来互动关系上。就近世中日关系而言,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后所推行的对日政策,不仅使两国关系遭受严重损害,而且还唤起了日本神国思想的高涨,以致后来明朝使臣到日本时,日本方面对中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鄙视和不以为然的态度。当时的日本朝野,对待中国,是文化上的尊奉与政治上的鄙视同时存在。这种神国思想与华夷思想的冲突,到江户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一方面是江户幕府为削弱天皇的权力基础而大大减弱了神国思想,另一方面是由于清朝入主中原而使华夷关系在日本发生逆转。当时不仅抵达中国的朝鲜使者们看到了“中华”帝国的风景不复存在,于是不再认同这个原来仰视的宗主国;而且身在长崎的日本人在观察明末遗民时,也表现出一种微妙的、发自我族自尊的怀疑和轻蔑。在日本人看来,随着明朝的覆亡,维护中华(其实是汉文化)文化纯洁性的重任已不属于中国,而归于日本。就在神国思想的减弱与华夷思想的转换过程中,儒教被进一步日本化了(甚至被视为日本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日本的民族自信心也大大增强了。与此同时,以舜水为代表的留居日本的明末士子,对传统的华夷秩序的世界观也产生了怀疑。面对明朝在对日关系上华夷思想

① 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论语·子张》)这个“肆”可以理解为店铺,也可以理解为手工作坊。实际上两者是一体的,都与市井商业、市民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舜水生活的松江府,正是以百工为表现形式的市民文化最发达的地区。然而,百工技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属“文人”所为,而是“匠人”所为。舜水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学者与匠人的统一,与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们的“工商皆本”理念是相辅相成的。尽管他并未提出过“工商皆本”的思想,但却在实践层面捍卫了这一理念。

的空有虚名,舜水等人在与日本人的相处中,不仅不再提传统的华夷秩序,而且还把“中华”的大旗主动让给日本,希望日本能继承华夏正统的衣钵,代替中国担当起传承中华文化的重任。因此,在明末的中日关系上,传统的华夷思想与神国思想的冲突已完全让位于中日两国的相互倚重、和平共处的关系^①。舜水的思想与实践正是这种变化了的中日两国社会政治现状的反映。

如同晚清的曾国藩,为了保存中国文化,宁愿站在清王朝一边一样,明末清初的朱舜水,也是为了传续中国文化而长期寓居日本。他一方面是试图借助日本的力量在军事上抗清复明,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对日本武士传统的改造而使之在文化上成为东亚的正统。自从舜水在浙西的繁华重镇松江接受了系统的朱子学思想的熏陶后,其在精神诉求和价值取向上,就已确立了恢复先儒传统、重建大同社会的文化理念。后来,当他意识到自己所憧憬的理想社会不能在中国实现时,便把兴学设教的圣道愿景寄托于异国他乡。《朱舜水全集》的序者后藤新平誉其“不得行怀抱于故国,而却传衣钵于我邦”^②,确非虚言。于是,舜水希望日本能仁武崇文^③,畅行文教,更化善俗,开物成务,并且认为日本已完全具备了接续中华文化、实施王道政治的各种条件,所谓“贵国今日之力,为之尚有余裕”^④,即含此意。这显然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

从舜水的政治哲学来看,深受《公羊》今文经说的影响是显

① 参见何英莺:《华夷思想和日本神国思想的冲突——论明初中日关系的发展》,载王宝平主编《神道与日本文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

② 《朱舜水集》,第796页。

③ 按:舜水高度赞扬德川光国的“聪明仁武”(《朱舜水集》,第50页)。“仁武”说是舜水对日本武士文化的重要改铸,也是武士道精神的内在要求。

④ 《朱舜水集》,第74页。

而易见的。若依《公羊春秋》所明之大义,尽管“尊王攘夷”是重要的基本原则,但“中国”与“夷狄”却并无绝对的限隔,其区别亦不在于种族之不同,而在于文化政治上的文明与野蛮之别。故虽“夷狄”而行王道则中国之,“中国”而悖于王道则夷狄之,是所谓“尊王一统”;孔子欲居九夷,即不以其为“夷狄”而卑鄙之。舜水既居日本,且托之以大同政治之理想,因此在概念上他实亦视日本为中国,而不视之为“夷狄”。^①在他看来,春秋时吴、越两国亦不过为“周之东夷”,“断发文身,侏离椎结以御蛟龙魑魅”,“荒陋不足数”,是故被“摈而不与中国之会盟”。然“今日之吴与越,则天下不敢望其项背矣”。所以切不可“以贵国(指日本)为褊小,为东夷”,而“谦让不遑”;更不可被中国人所谓的“中国胜于外国”的“逼窄”眼界所忽悠,而缩胸志短。事在人为,只要有贤明君主,并“佐以名贤硕辅”,一切“唯期锐志”于“建学立师”、“忠君爱国”、“移风易俗”之大业,就必定能复归尧舜,使王道大行于日本;关键是看“作人者如何耳,岂以地哉”!^②舜水的这种文化观与当时日本知识界为争夺东亚正统(比如称日本为“神州”或“中国”,即意味着真正的中国被夷狄化,而东亚正统的位置为日本所替代)而掀起的儒学复兴运动正好吻合,因而也就自然成了日本近世儒学兴盛的助推器。

在舜水之前,中国对日本的了解远不如日本对中国的了解。人们习惯用“一衣带水”来形容中日两国在地理上的近邻关系。两国之间仅一海之隔,人员往来相比于其他国家和民族,在古代就已称得上频繁亲密。然而,尽管日本对中国的了解和学习可

^① 参见董平:《浙江思想学术史》第五章第二节《朱之瑜及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5页。

^② 《朱舜水集》,第74、43页。

谓由来已久,但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和认识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历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东瀛扶桑在中国人的眼里,都被涂上了一层浓厚的神秘色彩,在中国古籍中常把日本描写成虚无缥缈的仙岛神州即为明证。这其中固然有客观条件方面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还在于中国人的世界意识:中国作为历史上亚洲诸国的文化输出者,一直是日本主动地来中国学习文化,而非中国主动地输出自己的文化,更不用说主动学习和研究别国文化了。中国人的天朝大国心态,不仅直接影响了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认识,而且还反映在其根深蒂固的日本观上。尽管隋唐以后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也在逐步增加,历代史书中已有不少关于日本的记载,从《史记》到《明史》总共 25 部正史中就有 15 部有“日本传”(或称“倭人传”、“倭国传”)。然而,这些记载,或者失之简略,或偏于两国交涉。如《元史·日本传》主要记载元军征日之役,而《明史·日本传》则着重写倭寇之事。况且这些记载均出于从未到过日本的史官之手,很多内容仅是道听途说之闻。至于曾经亲临日本的使者、文人、商人、僧人,却很少写有日本游记传世。到了明嘉靖、万历年间(1522—1619),中国曾掀起过一股日本研究热,究其原因,一是这一时期倭寇疯狂肆虐;二是朝廷广开“御倭策略”之言路;三是沿海地区经济和对日贸易的发展。这就使得从事日本研究的人开始增多,并且陆续有一批介绍和研究日本的书籍问世。如薛俊的《日本考略》、王文光的《日本考略补遗》、郑若曾的《日本图纂》和《筹海图编》、李言恭和郝杰的《日本考》、侯继稿的《日本风土记》、郑舜功的《日本一鉴》、王士骥的《皇明驭倭录》、谢杰的《虔台倭纂》、郭光复的《倭情考略》、张迪的《日本东夷朝贡考》、无名氏的《倭志》,存目的还有熊尚文的《倭功始末》、无名氏的《东事记实》等。虽然撰写这些书籍的直接起因大多是出于对付倭寇的需要,但其中亦